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常玉荣,何石妹.三套集成时期河北民间故事立体描写的知识生产实践——兼及民间文学的文本建构问题[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8(3):49-54.

三套集成时期河北民间故事立体描写的知识生产实践

——兼及民间文学的文本建构问题

常玉荣 何石妹

(河北工程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摘要:立体描写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关于民间文学学科本位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现了这一时期学界对于民间文学学科独立性的思考。立体描写理论在三套集成的搜集整理实践中得到了初步的贯彻和实践,河北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者围绕如何实现立体描写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践。从故事到故事家进而到故事村,文本语境探索和研究不断深入,采录者在搜集整理的理论和方法上进行了多方面的知识生产。尽管三套集成工作在民间故事书面文本的立体化建构方面有历史局限性,但其所作的尝试和努力成为民间文学文本建设的宝贵经验。

关键词:三套集成;文本建构;立体描写;民间故事

分类号:I2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5)03-0049-06

三套集成时期^①是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上重要的历史阶段,学界对三套集成取得的成果评价不一。有学者认为,在书面范式的民间文艺学研究路径上,三套集成达到了辉煌的顶点。^[1]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艺学面临变革的转折期,一方面是中国采风传统,另一方面是在国外理论影响下的蜕变求新。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中国学者积极参与并回应民间文学理论的探讨,段宝林的立体描写理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三套集成将立体描写理论上升为搜集整理的理论指导,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我们发现采录者在采

录实践中对于立体描写理论的践行突破了其刻板印象,为评价三套集成的贡献和历史局限提供了有效的视角。这有助于我们了解转折期民间文艺学的发展,系统认知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发展轨迹和历史逻辑,呼应当下对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范式和学科独立性的探讨。

一、采录实践框架下立体描写理论的初步提出

1949年后,我国展开了多次大规模民族文化遗

收稿日期:2025-01-18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三套集成’时期河北民间故事的文本化研究”(20230204028)

第一作者简介:常玉荣(1974-),女,河北邯郸人,教授,主要从事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

通信作者:何石妹(1981-),女,河北邯郸人,讲师,主要从事民间文学研究,E-mail:15303301155@163.com。

^① 关于三套集成时期的起止时间,一般认为是从1981年到2009年。1981年12月29日至1982年1月2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决定编辑一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歌、民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1984年5月28日,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发布了《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1986年5月,全国艺术学科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周巍峙宣布接纳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与其他七套艺术集成志书并列成为“十套文艺集成志书”,并向国家申报列入国家“七五计划”重点项目。2009年10月,三套集成全部出齐,共298卷,440册,历时28年。参见张文:《对民间文学集成工作的回顾》,《民间文化论坛》2009年第5期。其他学者也对这一过程进行过梳理,时间界定基本如上。

产的普查抢救工作。1958年前后,民间文学领域出现关于搜集整理的论争,其实质是如何看待民间文学文本,如何记录、写定民间文学书面文本。最终,学界达成共识:只有来自民间口头流传的民间文学,才是真正的民间文学。这场涉及民间文学文本建构的讨论,生发出新的批评话语,由此确立的民间文学文本理念以及“十六字”方针(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成为三套集成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工作原则。

基于上述文本理念,采录真正来自民间的口头文学,成为三套集成文本采录标准和目标。三套集成工作方案提出了“三性”^①原则,其中的科学性虽然具有多层内涵,但主要还是指文本,原汁原味的口头文本的忠实记录是科学性的首要要求。当时的采录者、专家对采录的科学性进行了多方面探索,但如仅停留在“三性”层面上探讨,难以深入到问题的本质,因此,须回到民间文学理论内部,尤其是要回答民间文学文体特征问题。对这一问题作出积极回应的是段宝林。他主张:立体性是民间文学的特征,立体描写是呈现民间文学立体性的研究方法。^[2]他的立体描写理论在民间文学的文本本体论和方法论上为三套集成的采录实践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指导。该理论代表了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理论建设的最新思考。显而易见,采录问题的探讨已经不同于前一时期的搜集整理的论争,而是返回文学内部,体现出较强的理论自觉。

立体描写理论在中国民间文学采录的黄金时期产生并在采录实践中得到应用和丰富,换言之,这一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是在民间文学采录的框架下展开的。段宝林提出民间文学的六个立体性特征,而要体现出这六个方面的特征,就需要在采录中“记录下所有的异文,描写作品演唱时的情景,创作与表演的目的、功用、表情与听众的反应,表演时内容的变化、流传的各种方式,等等,把作品的实用性、即兴创作、变异性、表演性及其综合的特性立体性全面地描写出来,这样的记录才是符合科学要求的”^[2]。这体现了段宝林在理论建设的初期,试图在采录中全面呈现民间文学立体性特征的设想。但是他并未对具体的实现形式、途径等展开深入的阐释,其理论还有待

在采录实践中不断修正和丰富。三套集成时期河北民间文学的采录以该理论作为指导,在实现形式、具体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尝试和探索。

二、河北民间故事的立体描写实践:故事、故事家、故事村

采录实践中立体描写由文本到语境的展开是渐进式的,最先是故事讲述本身的立体描写,再由故事到故事家,通过对创作和讲述人的主体性、个性化描写来呈现故事的立体性,故事村则是在更广泛的时空中关注故事的文化生态环。

(一)故事采录的立体描写

最初对民间文学的立体描写基于对单篇民间文学作品具体的记录整理过程。除了忠实记录故事之外,还要关注故事的讲述场景、地点、讲述者的表演行为、听众表现及讲述者与听众的互动交流,即段宝林所说的:“描写作品演唱时的情景,创作与表演的目的、功用、表情与听众的反应”。采录过程中,采录者可以直接获得讲述人提供的故事来源,对故事的加工,故事的功能、目的。另外,由于存在多人讲述的情况,同一个故事还会出现异文,这就涉及异文的整理。上述立体化描写信息以各种形式作为附属部分安排在故事文本的后面。三套集成工作方案也对民间文本的形式构成要素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除正文外,还有注释、附记、讲述者、采录者、采录时间、采录地点,保证以故事为中心的立体化描写能够有序呈现出来。

河北民间故事的采录工作非常重视使用注释、附记等要素,尽可能实现对文本的表演性及其他信息的描写。例如,在《耿村民间文化大观》中,赵志勇所记靳景祥的新故事《换表记》“附记”先说明此故事的来源:“是靳景祥老人二十多年前在石家庄西郊听一个工人老师傅讲的……靳景祥老人又不断对故事情节进行补充、修改。”“附记”还记录了靳景祥讲述时的表情:“今天他讲时,忽而站起,忽而坐下,眉飞色舞,动作贯彻始终,表现出一个大故事家驾驭复杂故事的功力。”“附记”对整理工作也作了说明:“由于靳景祥自小学过说书,在讲时用了许多评书套语和较文雅的词汇……这是他与耿村其他故事家讲述的不同之处。为了保持故事原貌和故事家的口语特点,我在整理时对以上情况未作改动,特做说明。故

^① “三性”是指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总方案》编选原则对“三性”的内涵进行了解释。

事题目是在整理时加上的。”^{[3](P165)}之后的附记更多、更详细。如1988年12月10日,崔分田所记王仁礼讲的《秦始皇赶集》“附记”：“早饭后我去王仁礼家提水,其妻张瑞彩正坐在门槛上簸玉米。她说:‘我给你讲讲《秦始皇赶集》吧。’王仁礼正在筛草喂小驴,他听到后,端着筛子从屋里拱出来:‘你别讲了,前言不搭后语的,一会儿我给人家分田讲。’他讲述时听众很多,乡干部、村干部,还有不少小孩。他边讲边辅以手势,像一踱、一拃等。据他说,这个故事是他岳父张老连(已故)讲的。”“附记”还说明了故事异文及整理情况:“这个故事在1988年6月初听张才才讲过,没录音。张瑞彩也给别人讲过,没讲完整。翻出王仁礼讲的录音后,我又找张瑞彩录了秦始皇量布一节,找张才才讲了卖豆腐脑一节,此为综合整理。记录稿均附在后面。”^[3]段宝林十分赞赏上述描述式记录,认为这种记录比较科学,因为一种异文只是故事的一个侧面,各种异文的总和才是该故事的立体面貌。^{[4](P301)}这也是工作方案确定的综合整理的方式。尽管这种方式在当下看来并不符合记录口头文学的学理和要求。

大量阅读当年的附记等信息后,笔者发现,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很难全面地在上述文本构成要素中呈现,附记等所能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且缺乏完整的有深度的地方性知识。因为当时采录的重点仍然是故事本身,而且耿村采录多是工作队进驻集中采录,附记的内容多是采录现场访谈和直接观察,描写固然具体鲜活,但对某些内容的描写不够全面深入。例如故事的来源记录,仅能了解讲述人是从哪里听到的,至于传承关系就很难说清楚。采录的时间和地点对记录故事的流传情况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仅单篇记录,作用有限,只有同类型大量相关记录,才会发现故事的流传信息。故事的流传情况也不是依靠单篇作品的采录就能够发现的。

讲述者也是与故事密切相关的立体描写的要素,但是文本之后仅有对讲述者基本信息的记录。附记中对于故事家讲述及其表演行为的描写也是一次性讲述的呈现。至于故事的讲述风格,则需要考察大量的讲述行为进行总结,且要与讲述者生平、身世相联系,才能发现故事家的个性特征。诸如此类的情况,还有很多。因此,在单篇作品的采录阶段,远未实现民间文学多方面的立体描写。

(二)从故事到故事家

由于与故事联系最为紧密的是故事的讲述者,故事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学界普遍意识到口头文

学的生产者创作倾向、讲述风格直接影响到文本的面貌,是立体描写的重要内容。于是,故事家专集以及关于故事家生平、身世,讲述特点,人际传承等研究性文章应运而生。故事家研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都是研究热点,甚至持续到21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朝鲜族故事家金德顺的专集和调查报告、汉族故事家刘德培的专集《新笑府》及调查报告。山东、辽宁也出版了故事家专集。河北的故事家研究走在全国前列,1990年出版《耿村故事百家》,包括93位故事家的作品。

河北的代表性故事家享有国际声誉。以故事村耿村为例,1988年,耿村能够确定的大中型故事家有26人,另外还有一大批讲述者。故事家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是多方面的,就民间文学立体描写而言,也是理论建构的重要一步。研究成果有袁学骏的《耿村民间故事论稿》^[5],林继富、李继儒的《靳景祥故事讲述研究》^[6]等专门论著。袁学骏还从本体论、群体论两个层面系统描述了耿村故事家的群体特点和代表性故事家特征。他从故事家的身世、文化背景、性格、职业、传承等角度论述故事家的讲述风格,大大丰富了对民间故事的产生、流传等问题的认知。例如,故事家靳景祥研究超越了单篇作品局限于讲述动作表情的描写,而是综合多种场景下的表演,概括其风格特征:喜欢站着讲,习惯用一些评书套语,惯用模仿的手法,善于与听众互动。通过对其生平、职业、经历、故事来源的深入查访以及对所讲故事的分类统计,对故事的流传情况有了更加清晰全面的认知。故事家研究其实是在创作主体层面进一步发掘故事的产生特点,较为系统地把握故事传承、流传等特征。正如段宝林在评价耿村现象时说的,从单篇作品到故事家,立体描写理论向前迈进了一步。^{[5](P39~138)}

“民间故事的生成具有厚重的文化传统基因,虽然我们无法清晰每个故事的来源,但是,一个地方的叙事资源是有限的,也是可以梳理清楚的,传承人讲的故事及其传承关系亦是明白和具体把握的,这就要求我们要特别重视民间故事传承人和他的生活轨迹,详尽访谈和记录传承人的生活史,以及他所记忆的人、事、物和他的个人观点,查找和记录传承人生活区域的自然、历史、文化等内容,采访和记录传承人现今的生活、家系和社会关系、社会活动等,编制故事传承人和故事流动的网状结构图,探索故事传承与地方文化发展的关系,探讨文化关系网络之于传承人讲述个性、传承人故事讲述之于民间叙事传统的价值和意义。”^{[6](P10~11)}

(三)故事村:故事文化生态的整体观照

三套集成时期,全国发现的代表性故事村有河北藁城耿村、湖北丹江口伍家沟村、重庆走马镇等。河北耿村被誉为“中国故事第一村”,其民间故事的蕴藏量,还有故事家的数量震惊国内外。关于耿村故事村的研究,也成为立体描写实践的重要部分。从采录层面看,故事村是对某一人群聚集地——村落的文化特质现象的命名,这一命名有特定的内涵或者要求。袁学骏曾经从三个方面提出故事村命名的标准。^①命名之初仅仅是为了标注独特的故事存在形态,恐怕并未自觉意识到故事村概念对立体描写理论的贡献。

立体描写理论在实践中存在一个语境描写边界的问题。故事的立体描写关涉到一个重要的要素是故事生存和流传的时空,故事发生的原因、目的、功能、流传场域、民俗文化诸多信息都由这一时空承载。地理、交通、经济、文化等地方性知识都是建立在特定人群聚落时空里的,具体的民间文学不论是单篇的,还是聚集性共生现象,其生存境遇和文化生态的描写总要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时空。“故事村”这一概念,可以说提供了一个基于地缘和血缘关系的独立时空,为描述故事的语境确立了比较明确的边界。河北耿村故事村立体描写以村落故事群为中心,耿村的地理、经济、文化等民众的日常生活作为立体描写内容,以超链接形式与故事群发生关系。所有与故事相关涉的立体信息——故事的流传,故事家代际传承和交流,听众圈及其故事家以及二者共同的文化心理,故事的功能等,才得以立体化呈现。

河北耿村故事村立体描写将耿村作为独立时空,很少使用附记的形式,而多用田野报告、专门文章,跳出具体作品,从宏观上分析概括,将耿村作为整体进行观照。《耿村民间故事集》(第一集)中收录的第一次进村的调查报告,首次对耿村的文化生态进行了关注,“村中有一种讲故事、听故事的民间文化氛围,庙会活动和集市买卖风俗也是整个耿村文化的一部分。”《耿村民间故事集》(第二集)中由王树成、袁学骏执笔的调查报告,更具体地描写了耿村“浓厚的文化气氛”,“这种文化气氛,连十年动乱中也没有停止过。”故事讲述的时间、地点以及功能都

发生了变化:“整个大锅饭时期,客观上还是民间故事大传播时期。好多故事由炕头搬到了田间地头,由‘讲不完的冬仨月’,变成了天天讲,常年讲。”生产队长利用故事家讲故事的专长促进劳动生产:“像王仁礼锄地时,队长让他居中占垄,别人左右雁翅排开。他边锄边讲,别人都怕听不到,便紧紧跟上,无一落后。孙胜台摘棉花、拔苗,也能带着一群人。他们是不挂衔的队长。”民间故事素有教育功能,文中也有生动的描写。如梁银兰老大娘见邻居母子吵架,就讲了《放着活佛你不拜》和《孝子》两个故事进行劝解,生动地说明了“亲娘就是活佛”“深山敬佛不如在家敬母”的道理。母子受到教育,矛盾顺利解决。儿子因为工作不好,想调动,靳景祥讲了一个人三心二意、一事无成的故事,教育儿子,儿子因此醒悟。耿村的商贸活动与故事传播的关系,文中也有专门说明。“据不完全统计,全村大小个体工商户包括季节性工商户已有近百个。他们从田间闯入城镇,参与市场竞争,但并没有放弃那传流千年的民间故事。王仁礼卖烟叶,靳满良上京下卫,都不妨碍他们的讲述活动。青年司机徐全振常年跑车在外,他走到哪里讲到哪,以故事换故事,成为同行中的活跃人物。”耿村有大集,各处客商来此做生意,闲时即讲各地故事,使耿村成了故事交汇集散之地,故事村的形成与此亦颇有关系。可见商品流通不但不影响故事讲述活动,反而促进了故事的交流。

调查报告其实也对民间文学的目的、功用等进行了描写研究,感性的描写却让人不觉肤浅,反而是对民间文学价值的生动呈现。虽然不是学院派认可的理论意义上的研究,但是段宝林却认为这是一种特别的研究,肯定并大力倡导这种研究方法。袁学骏对此进行了持续的探索,他在耿村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主题就是耿村为什么成为故事村,他从耿村的历史入手,介绍了耿村的地理位置、商贸、集会等活动,并认为上述商贸和集会与民间故事的聚集有着密切的联系,交通、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交流和繁荣。^{[7](P27~30)}他的《耿村民间文学论稿》更是以“耿村文化根”专章对上述内容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不仅从经济、民俗的视角,还深入到耿村民众的文化心理,研究成果立体地呈现了耿村民间文

^① 袁学骏在《关于“民间故事村”的内涵》中界定了故事村的内涵:“必须有一个占居落人口一定比例的民间故事讲述群体;必须有比较浓厚的民间文化氛围,有活跃的讲述者和热心的听众圈层;必须有大批高质量的故事作品。”参见《中国耿村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6页。

学的生存境遇。之后还有《耿村民俗大观》这样专门的耿村民俗立体描写研究。

民间文学的流传或者传承也是其立体性特征的体现。这一方面,当时的采录者和研究者也颇多关注,全面的梳理依靠众多的采录者完成,而最终的理论成果是袁学骏《耿村民间文学论稿》中的第二三两章,分别是对耿村故事家群体和本体论的研究,辨析和梳理故事家代际关系、地缘关系、血缘关系,确定其故事的来源和传承关系,可以说是非常系统的传承关系研究。乌丙安对耿村的故事家传承也有所论述。^[8](P84~88)

从故事到故事家再到故事村,体现出采录实践中的立体描写探索,采录借助故事家、故事村等概念,多层次呈现了民间文学文本的立体化特征。在立体描写逐渐走向深入的过程中,大量的语境信息得到挖掘、记录和研究,以各类文体形式保存下来,且多数是可以不依赖故事,独立存在的文本。这也是民间文艺学研究范式向民俗学研究范式转变的开始,由文本转向对语境的关注。三套集成文本被普遍认为是书面范式,是在作家文学的规范下的记录和整理。而这一时期对新理论的探索却未引起关注和探讨。立体描写实践不仅让这一时期的采录关涉到更广泛的与文本相对的语境范畴,同时也在探索口头文本的立体化呈现方式。这正是三套集成所孕育的新路径的起点。近些年源于对民间文学学科独立性的思考,有学者开始呼吁回归文本。^[9]返回文本,我们发现三套集成对此所作的尝试,会有助于理清民间文艺文本理念的发展轨迹。

三、返回文本:立体化文本建构

突破二维书面文本对民间故事记录的局限,是民间文学文本建设的根本问题。三套集成工作方案对单篇故事的书面文本构成要素做了规定,包括文本、注释、附记、讲述者、采录者、流传地区、采录时间地点等,以单个文本为中心,试图全面真实地呈现民间故事的立体化特征。最初的设想是在单篇作品的采录中建立起这种立体性,但效果不尽如人意。在上述要素中,以文本为中心,其他信息的记述简单浅显,信息量十分有限。例如,讲述者,就是对其姓名、

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的简单记录。附记限于篇幅,可以满足表演性情境等信息记录,但在描写故事所涉及的更深更广的文化生态方面就难以胜任,所以,才引发了人们对故事家和故事村的关注和研究。故事家研究实质是对故事的流传、传承、创作、表演等要素的研究,故事村是对故事的文化生态时空的研究。民间文学的采录是以文本为中心的,这些立体描写信息如何与文本发生关联,构成一个立体化呈现的文本?有学者提出数字化时代的文本新形态——“超文本”概念^①,以“立体化文本”命名所指涉的以故事文本为中心的超链接建构,与故事文本相关的其他立体化描写以各种文体形式呈现,并作为子文本链接故事文本。河北的采录实践中,采录者运用了多种文体,形成了多个子文本,例如调查报告、故事家大传、座谈记录、普查体会、田野日志、序、后记、录音、图片、地图等,对立体化文本的建构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上述子文本在立体化呈现民间故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数量也是巨大的,但并未完全呈现出来,当年所取得的成果能看到的仅仅是冰山一角,未引起学界的关注。各省卷本、县卷本、各种作品专集等,因各种原因,也仅仅以展示故事文本为主,而对各种子文本收录甚少。有的子文本另行发表,被保存了下来,大量的调查报告、田野日志、异文等则被湮没。这些资料还有一部分保存在采录者手中,他们当年的手写本、工作记录是最珍贵的立体化描写。

民间文学的立体化特征体现在文本上,必然不是单个故事文本孤立存在,而是包含若干子文本的超链接存在形态。当下学者在口头研究范式的框架下,以“文本-语境”这对范畴探讨口头文本的内容要素,仍然未就口头文本的存在形态构成的形式要素等展开充分讨论。民间文学的立体化文本建构在三套集成时期其实并未实现理论的自觉,而是在立体化描写的动因下的努力。或者说,以故事文本为中心的多个子文本层次化、秩序化建构的立体化文本并未建立起来。有些子文本的写作初衷未必就是要实现立体化文本的建构。当下,陈泳超等学者开始倡导民间文学文本学建设^[10],这也成为确立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独立性的重要工作内容。回溯三套集成

^① 冯文开提出,在数字化时代,以演述为中心的文本由静态走向动态,逐渐形成非线性或多线性的超文本,利用数字技术将口传文学的演述更完整、更真实地呈现出来,将文字、数据、图像、录像、摄影、声音等丰富而生动地组合在一起。详见其文章《口传文学文本化观念的演进:转向以演述为中心的学术实践》,《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时期,我们发现中国民间文学各方参与者的努力及其价值,回应了当下对于民间文学立体化文本建构的期待。

四、余论

段宝林提出的民间文学立体化特征涉及到民间文学理论建设的多个层面,是对民间文学本体研究和方法论的自觉思考。这一理论在三套集成时期主要是对采录实践的指导,是以文本为中心的立体描写。一方面,立体描写理论对确保这一时期采录的科学性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三套集成的实践也在丰富发展这一理论。同时,三套集成作为阶段性的以采录为主要任务的工作,也只能是部分完成立体化描写,立体描写需要在后续的研究工作中实现。换言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描写研究将要在更长一段时间发挥其作用。

三套集成采录的工作机制使民间文学某些立体性特征的获得和呈现难以实现。三套集成采录是按照行政区划分别考察,分县区独立进行,采录者往往在其所熟悉或者被指定的地区进行采录活动。这种工作机制的优点是集中挖掘特定地区的民间文学资源,注重可行性。然而,这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例如采录者局限于其所在的地域,视野受限,对于跨区域流动的民间故事的存在面貌,便无法描述其传承谱系。集成要求文本要记录流传地区,事实上,这一点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确定的,只能大致划定范围,其视域也不出采录者和讲述者的生活和认知范围。还有异文的问题,采录者个体因为调查地域的限制,搜集的异文非常有限,根本不可能做到“记录下所有的异文”。因此,在采录阶段,是很难完成民间文学文本的异文搜集与比较的。

立体化描写可以针对单个文本,也可以是故事群。表演性可以在对单个文本的描写中基本实现,属于文句语境研究;故事村是以故事共生现象为采录和研究中心展开的故事的文化生态研究,阐释地方与故事的生成关系,属于文化语境、社会语境研究。事实上,民间文学的立体化特征不限于此,还涉及多个层面。例如,流传研究。流传研究突破单个文本、故事群在某一个地域的静态存在,是对故事在时间链条上的空间流动和内容衍化情况的描述。尤其是影响大、流传广的传说,因为其涉及到多地区,

异文多,流传路线复杂,其立体描写的难度更大。民间文学的流传形式、途径、范围的立体性存在相似的描述困境。概而言之,民间文学的立体化特征描写需要多领域、多视角的专门研究才能达成,单纯围绕文本采录很难系统描述。

由中国民间文学理论家提出的立体描写理论,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发展中并未引起普遍的讨论,反而是西方的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仪式理论等深刻影响了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范式。当下,以三套集成实践为切入点,对这一理论展开讨论,是试图与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建设问题展开对话。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是学科独立性的基础。在口头研究范式下,民间文学文本的口头性、立体性已经得以确立,民间文学文本的立体描写成为最需要直面的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立体描写理论及其他由中国学者提出的“生活相”“民间文学志”等话语,可以作为中国民间文学文本理论建构的基础,在深入与西方理论展开对话中,建构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话语体系。回溯三套集成及中国学者的理论探索,其意义即在于此。

参考文献:

- [1]刘宗迪.从书面范式到口头范式:论民间文艺学的范式转换与学科独立[J].民族文学研究,2004(2).
- [2]段宝林.论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J].民间文学论坛,1985(5).
- [3]袁学骏,李保祥.耿村民间文化大观[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 [4]段宝林.论耿村故事的立体描写[A].中国耿村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1.
- [5]袁学骏.耿村民间文学论稿[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
- [6]林继富,李继儒.靳景祥故事讲述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 [7]袁学骏.耿村民间文学与民俗事象发掘经过和成果[A].中国耿村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1.
- [8]乌丙安.耿村故事传承论析[A].中国耿村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1.
- [9]陈建宪.略论民间文学研究中的几个关系——“走向田野,回归文本”再思考[J].民族文学研究,2004(3).
- [10]陈泳超.倡立民间文学的“文本学”[J].民族文学研究,2013(5).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